

# 试析儒家德育的三种类型及其现代命运

叶飞

**【摘要】**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儒家德育与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并不总是形成共谋、共存的关系。从儒家德育与封建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来分析，至少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儒家德育：一是前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它没有成为封建专制权力的意识形态工具，它与专制权力保持着距离；二是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它与封建专制权力形成了共谋关系，最终成为了封建专制权力的意识形态工具；三是后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它从封建专制权力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一种更为纯粹的品德教育形式。这三种类型的儒家德育对于现代道德精神和现代教育的适应能力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它们也将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现代命运。

**【关键词】**儒家德育；前权力型的儒家德育；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后权力型的儒家德育

**【作者简介】**叶飞，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博士（江苏南京，210097）

儒家德育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教育传统，在构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和教育观念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从民国初年至今，就一直有一种观点：儒家德育是封建专制权力的意识形态工具，它培养的是服从于专制统治的奴隶人格。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儒家德育与封建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而言，至少可以把“儒家德育”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前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它未成为封建专制权力的意识形态工具，而主要是一种基于儒家仁道信仰的道德教化模式；它在时间上形成于先秦时期，并且在此后的时代获得了不同程度的传承和延续。二是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它与封建权力意识形态形成了共谋关系，成为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教育工具，它在时间上形成于两汉时期，并且一直延续到晚清。三是后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它随着晚清帝国的解体而产生，代表着儒家德育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的解体。以下笔者将对这三种类型的儒家德育及其现代命运进行更详细的阐述。

## 一、前权力型的儒家德育

前权力型的儒家德育主要形成于先秦时期，其所蕴含的道德精神和教育精神一直延续至今。这一类型的儒家德育没有成为封建权力意识形态的工具。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先秦儒家以及儒家德育还没有进入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视野，且百家争鸣使得儒家没有成为唯一“正统”的思想。因此，前权力型的儒家德育还没有被封建意识形态所控制，它在很大程度上彰显出了儒家的“仁道”精神，而不是封建权力意识形态的专制精神。

### （一）对于“仁道”信仰的坚守

先秦儒家一直致力于从周人的“天命”观念中解放出来，转而将伦理体系和道德教育体

系降至凡间，来引导世俗生活以及现实中的人伦关系。可以说，孔子是第一个提出“仁道”的儒家学者和教育家。仁道不仅仅是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同时也获得了超越的、形而上的意义，最终成为了先秦儒家的道德信仰。从鬼神信仰转向“仁道”信仰，正是先秦儒家道德教化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第十一》）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孟子·公孙丑上》）

孔子不愿回答季路所提出的“鬼神”与“死亡”问题，并非因为孔子是无神论者，其根本原因是孔子希望在教育过程中要尽量回避关于鬼神和死亡的讨论，而应回归于现实的道德生活和道德追问。儒家所强调的“道”是仁道，仁道是人心的“安宅”，而不是鬼神之“道”。因此“，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秦的儒家德育是以“仁道”为核心内容而不是以“鬼神之道”来展开道德教化的。

基于“仁道”的信仰，先秦儒家与专制统治难免会形成冲突关系：他们往往成为黑暗社会秩序的批评者与反思者。孔子批评季氏，孟子批评梁惠王。在先秦儒家看来，道德与仁心使人超越于一切存在者而成为最可宝贵的存在者，而且改变黑暗政治秩序正需要人的道德之心。所以，在先秦的儒家思想和儒家德育中“，仁道”是一个终极的道德原则，儒家德育不是专制权力的意识形态工具，而是始终与权力意识形态保持着距离。

## （二）对于德性品质的追求

作为儒家的道德信仰，“仁道”具有终极信仰的意味。在终极信仰的指引下，先秦儒家倡导人的德性品质的培养，这些德性品质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等。先秦儒家并不要求弟子为了“仁道”信仰而走向外在超越，放弃世俗的生活，而是希望弟子们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在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中展现出应有的道德品质。《中庸》里有一段话：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

朱熹于《四书集注》中对这段话有精辟的解释：费，用之广也；隐，体之微也（1）。据此，《中庸》里这段话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仁道”（即君子之道）是精微而用途广泛的，它的至精至微之处，就算是圣人也无法透彻知晓；而它对于人伦日用和德性品质的追求，却是愚夫愚妇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到的。可见，作为至精至微的“仁道”信仰，它是现实中具体的仁、义、礼、智、信等德性品质为基础的。因此，先秦儒家经常告诫弟子们，必须不断地进行道德的自我修养和自我锻炼，来完善自身的德性品质。德性品质的修炼和完善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它需要接受长期的苦行生活的考验。

先秦儒家对于德性品质的强调，事实上与封建专制权力的意识形态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超越于政治意识形态之上的，它指向于人的道德信仰和道德品质的培养。

也正因如此，先秦儒家（以孔孟为代表）在社会政治现实中屡屡碰壁，因为他们的道德教化逻辑与专制统治逻辑是相背离的，他们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很难与专制统治阶层分享。最终，德性品质的道德教化方案仅仅成为了孔子和先秦儒家的一种理想追求，而并未融入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之中。

## 二、权力型的儒家德育

如果说先秦儒家及其所形成的道德教化精神还没有成为权力意识形态的工具，那么两汉以来直到明清时期的“体制内”的儒家德育则可以说已经被专制权力意识形态所“同化”了，并且逐渐沦为了权力意识形态的工具，因此，我们称之为“权力型的儒家德育”。权力型儒家德育的基本特性集中表现为儒家德育的权力化和制度化。

### （一）儒家德育的权力化

先秦时期所形成的儒家道德教化精神在秦汉以后逐渐遭到了专制权力的干预和破坏。狄百瑞指出，正因为先秦儒家的道德精神与专制权力不相契合，导致了秦朝的“焚书坑儒”事件<sup>〔2〕</sup>。李斯在给秦始皇的奏折中就提议：“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由此可见，专制权力起初是非常痛恨儒家的。“焚书坑儒”之后，儒家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意识到，如果再去寻求专制权力的保护，那么儒家将面临覆灭的危险。因此，儒家德育的“专制权力化”、“意识形态化”成为当时社会背景下的一种必然选择。到了两汉时期，儒家德育的权力化、意识形态化更加明显。以当时的儒者叔孙通为例。叔孙通本是一个普通的儒者，但是一次特殊的事件却让他改变了自己和弟子的命运。根据《汉书》记载，高祖在位第七年，叔孙通按照儒家礼法为高祖设计了一整套朝仪。朝仪的场景是：

“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下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拜通为奉常，赐金五百斤。通因进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sup>〔3〕</sup>

这次朝仪获得了汉高祖的高度赞扬，叔孙通及其弟子也获得了朝廷的加官进爵。这次事件可以看作是儒家向专制权力靠拢的代表性事件。一旦儒家改变自身的道德理想而向权力中心靠拢，那么就将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儒家道德教化体系被封建权力所“异化”，它失去了自身的内在精神；二是儒家道德教化体系被专制权力所接纳，它最终成为了专制意识形态的教化工具。总体来说，两汉以后直到明清时期的权力型儒家德育，正是儒家改造自身以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个直接结果。权力型儒家德育始终处于封建专制权力的掌控之下，建立了以“三纲”为核心的道德教化体系，传递着压制人性、压迫人心的专制伦理精神。最终，儒家德育与专制权力形成了共谋关系，儒家德育成为了专制权力的辩护者和代言人，成为了专制权力意识形态的工具。

## （二）儒家德育的制度化

在封建时代，儒家伦理占据了封建制度的核心位置，而儒家德育也成为了封建教育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儒家德育被“制度化”了，它成为了官方制度体系下的唯一合法德育模式。儒家德育的制度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儒家道德学说的制度化。汉武帝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制度方针，奠定了儒家道德学说在教育体制内的唯一合法性地位。道家、法家、名家和其他诸子百家的学说均被禁止，最终的结果是，儒家道德学说在百家学说中获得了至上的地位。此外，汉武帝还“置五经博士”，《诗》、《书》、《礼》、《易》、《春秋》正式成为了唯一具有真理性、道德合法性的教育文本。这使得儒家道德学说进入了教育制度的层面，成为了真理性的道德学说，在各级学校教育中进行记诵和传递。

其次，儒家圣人的制度化。这主要表现为孔子、孟子等儒家先师获得了政治统治者的承认，其地位被崇高化并且制度化了，而祭孔仪式也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教育仪式。在传统社会的私塾、义学、府学、县学、太学等各级各类学校中，学生入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祭拜孔子，尊奉孔子为心灵的导师。孔子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教师，而是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神圣”的象征。孔子的圣人化，意味着教育制度承认了儒家道德学说的“圣化”，承认了儒家在教育体系中的唯一合法地位。

第三，儒家道德教化模式的制度化。汉武帝时在中央设立了太学，在地方设立了郡学、县学、乡学，德育内容上均以儒家经典及其价值内容作为主体部分。汉代私学中的书馆和经馆也多是以儒家典籍为主要教材〔4〕。这种制度化的安排在唐、宋、明、清时期也基本上得到了延续，各个时期的教育制度均认可了儒家道德教化模式的核心地位。在科举考试和八股取士的推波助澜下，这种制度化安排更加突出。

综上所述，权力型儒家德育与封建专制权力所形成的共谋共存关系，虽然提升了儒家在社会上的地位，但是也磨灭了儒家的伦理真精神，最终使自身成为了封建权力意识形态的工具，沦为压制人心、压制人性、压制思想的道德教化模式。可以说，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已经将儒家道德教化引向了“异化”的轨道，这与前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形成了本质的差异。

## 三、后权力型的儒家德育

后权力型的儒家德育产生于晚清、民国时期。后权力型的儒家德育是伴随着权力型儒家德育的解体而产生的。随着晚清帝国的解体以及民国“、五四”时期的教育改革浪潮的风起云涌，权力型儒家德育逐渐从历史舞台中退出。1916年“读经科”被废除，1922年“修身科”也被废止。自此，儒家德育退出了教育体制的中心位置，儒家德育与封建权力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也走向了解体。但是，儒家德育就此消失了吗？显然没有。虽然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在近现代社会已经走向了衰亡，但是这并不代表儒家德育已经死亡。随着儒家德育与封

建专制权力之间共谋关系的破裂，儒家德育不仅没有死亡，反而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笔者称之为后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后权力型儒家德育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反专制权力、反封建意识形态的。权力型儒家德育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工具，但是后权力型儒家德育却从封建意识形态中解放了出来，它不再是封建意识形态的教化工具，而成为了一种文化与价值的传递方式。比如，在当代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学校德育中，儒家价值观依然进入了学校德育的课程设置，但是它并不是作为专制权力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存在的，而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传递方式而存在着。这正是后权力型儒家德育的基本特征，它反对成为专制权力的工具，但是它坚持教育的文化传承和文化使命。

其次，它具有深刻的文化性和教育性，而缺少政治意识形态性。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后权力型儒家德育并不是作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而被提出的，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和价值观的传递方式被提出的，它体现着深刻的文化性和教育性。所谓文化性，即它强调的是儒家文化传统的传承，而不是封建政治传统的传承。所谓教育性，即它的根本宗旨是培养青少年学生的德性品质，而非培养他们的政治品质。正因如此，后权力型儒家德育的主要目标是固守文化的根性，实现儒家文化及其价值精华在年轻一代身上的传递，而不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服务。

#### 四、儒家德育的现代命运

儒家德育的三种类型（前权力型儒家德育、权力型儒家德育和后权力型儒家德育）由于各自的不同性质与内涵，在现代社会以及现代教育体制中将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 （一）前权力型儒家德育的现代命运

前权力型儒家德育的伦理基础是先秦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它并不纯然是封建权力意识形态化的专制伦理体系，而是蕴含着优质的伦理精神，如仁、义、礼、孝、智、信等。这些伦理观念指向于建构良好的人伦关系：“仁”使人能爱人，“义”使人愿意舍弃利，“礼”使彼此之间彬彬有礼，“孝”使人能够尊重长辈，“智”使人能够智慧地处理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信”则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先秦儒家的这些价值观念可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对于现代生活和现代教育依然具有价值。因为现代生活同样需要仁义道德，同样需要诚意互信，同样需要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以，前权力型儒家德育虽然产生于先秦时期，但是它所提倡的道德教化精神是各个时代都在传承的，它所倡导的儒家优秀价值观念至今依然是鲜活的、有价值的，可以融入到现代德育体系当中并成为德育课程的重要资源。正因如此，前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及其所传递的优秀价值观念并不会被现代社会所淘汰，它反而将在现代社会中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 （二）权力型儒家德育的现代命运

权力型儒家德育与封建专制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扮演着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角色。

在近现代的教育改革中，随着教育现代性的展开，封建教育制度已然解体，权力型儒家德育也失去了制度的依附，走向了衰亡。因此，权力型儒家德育的现代命运是走向“死亡”的命运。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权力型儒家德育所倡导的以“三纲”为核心的道德教化体系已经无法适应现代教育，甚至是与现代教育理念完全背离的。<sup>①</sup>因此，权力型儒家德育很难适应现代生活和现代教育，它被现代教育所淘汰已经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 （三）后权力型儒家德育的现代命运

后权力型儒家德育是随着权力型儒家德育的解体而产生的，它一方面从专制权力的意识形态体系中解放了出来，另一方面又延续和吸收了儒家伦理的真精神。因此，它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它的前途命运是光明的。

首先，后权力型儒家德育清除了一系列糟粕性的价值取向，使得它能够成为一种有生命力的教育形式。后权力型儒家德育至少清除了以下不良的价值取向：一是权威取向。后权力型儒家德育倡导现代性的平等、民主和主体性的道德精神，反对片面服从权威。二是家族中心主义取向。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封建教育体系强调家族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它的极端表现是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sup>〔5〕</sup>。后权力型儒家德育则吸收了现代伦理精神，从家族中心主义中解放了出来，关注他者、社会的公共利益。三是男性中心主义。在封建专制社会的“三纲”伦理中，男权、夫权得到了片面强化，而妻子的权利、女性的权利却遭到了漠视。后权力型儒家德育则倡导两性的平等，它批判这种“男权中心主义”。

其次，后权力型儒家德育还吸收了儒家伦理中的积极价值元素，这些价值元素极具现代气质，与现代道德精神相契合：一是儒家的仁道精神契合于现代道德精神的讲仁义、重道义、关爱他人、助人为乐等；二是儒家的恕道精神契合于现代道德精神中的宽容、体谅、关切等；三是儒家的孝道精神契合于现代道德精神中的孝敬、尊重长者、尊老爱老、养老敬老。这些优秀的儒家价值观可以成为现代德育的重要道德资源，能培养年轻一代的道德品质。

总而言之，三种类型的儒家德育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命运。权力型儒家德育已经随着封建教育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它面对的是“死亡”的命运。前权力型儒家德育虽然年代久远，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儒家伦理真精神一直传承至今，它在现代社会中并没有走向消亡，而是具有现代性的价值，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与现代教育的重要道德资源。后权力型的儒家德育吸收了儒家伦理的真精神，同时淘汰了儒家意识形态的糟粕，因此它可以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在现代教育中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

### 参考文献：

-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37.
- 〔2〕狄百瑞.儒家的困境〔M〕.黄水婴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6.

- (3) 班固.汉书(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1640-1641.
- (4)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5-108.
- (5) 龙佳解,阳桂红.论民间大众价值取向与儒家伦理的关联(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21-26.

## **Analyzing Three Types of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 Their Fate in the Modern Times**

YE Fei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long history of evolution,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didn't always have a coexistent relationship with the feudalistic ideology. Analyz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and feudalistic power ideology, at least three types of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can be found. One is the pre-power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which didn't become the ideological instrument of feudal tyranny, keeping a distance with it. The second one is the power-based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which made plans together with the feudal tyranny, finally becoming the ideological instrument of it. The third one is the post-power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which was liberated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feudalist tyranny, becoming a purer form of moral education. The three types of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in their adaptation to the modern moral spirit and modern education. Therefore, they will be faced with different modern fate.

**Key words:**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pre-power Confucian moral; power-based Confucian moral; post-power

本文选自《教育理论与实践》2012年第1期